



▲从左至右依次为俞樾、吴昌硕、任伯年。

【文化杂谈】

吴昌硕也有一个朋友圈

□肖复兴

在杭州，正好赶上浙江博物馆举办的《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特展。如今，国内展览馆的特展增多，有了专业策展人的介入，水平提高很多。这个特展有想法、有特点，删繁就简，集中一点，而非那种作品陈列式、拼盘式、全家福式或从猿到人编年体的传统展览。

《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用时尚词语，以吴昌硕和他各个时期朋友之间的交往为线索，勾勒出他一生的行为思想轨迹，展现他的艺术品性和性情特征。这里有他和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书画雅集以及为朋友制定的润格等。不是他一人的独唱，而像是一湾活水流动了起来，自有波光潋滟以及两岸风光旖旎。

难得的是展览中的作品不仅有浙江博物馆的馆藏，还有从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借来的，可谓名副其实的特展。展览从吴昌硕年轻时在家乡的芜园与他最初的启蒙老师开始，到他晚年八十大寿朋友题诗赠画而止。一个再如何有名的画家，也如普通人一样，有了朋友之间的相互依托，才能够如一棵树长满枝叶花朵，完成自己的一生。这里有吴昌硕的很多朋友的作品展示，有很多于我是第一次见到。

以我这样外行人的眼光看来，这些朋友的作品，很多不见得比吴昌硕的差，足见一个时代伟大人物的出现，绝非单打独拼，一定是在百花竞放中一同盛开。同样，在20世纪初期欧洲的音乐界，和吴昌硕所在画界一样，涌现出的不是一位，而是有德彪西、马勒、勋伯格、理查德·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等一批伟大的音乐家。在其他艺术和非艺术领域，一样都出现了烂漫似锦的场面，比如文学就有普鲁斯特的浩瀚长著《追忆似水年华》占据春光，心理学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鸣惊人，美学有克罗齐的《美学》问世，科学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诞生和莱特兄弟的人类第一架飞机上天……

《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画坛风起云涌的博兴。吴昌硕早期老师潘钟璫（潘祖荫之族兄）为其铭刻赤乌七年砖砚拓本的题跋轴，凌霞为其画的墨梅册，潘泂升为其所作的篆书“苦铁居”横幅，俞樾为其《篆云轩印存》所作的序，杨岷赠其的对联……看得真是让我心动。特别是俞樾的序中借唐李阳冰篆刻四法勉励吴昌硕：“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矩方圆谓之巧。”还有杨岷的隶书对联“铁味苦胜铜臭 诗道穷借缶鸣”，不仅是对年轻的吴昌硕的期许，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具有警醒的意义。杨岷的字写得实在是好。吴昌硕，就是在这样的前辈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展览中很多吴昌硕朋友圈的

作品，让我大饱眼福。所谓艺术氛围，就在于此吧，没有彼此的砥砺、相互的镜鉴，一群人的水乳交融，氛围便形成不了。展览中，有两幅任伯年为吴昌硕所作的画。一幅是《蕉荫纳凉图》。这是一幅很有名且有故事的名画。朋友圈中，任伯年的出现，对于吴昌硕至关重要，成为他大器晚成的一道界碑式的象征。当年，吴昌硕甚爱这幅画，不幸后来被盗，为此他痛苦不堪。几年之后，朋友在上海发现，重获此画，交还吴昌硕。劫后重逢，喜极而泣，足见吴昌硕对任伯年的感情。

另一幅是王震画吴昌硕肖像图。对于吴昌硕，王震是另一位重要人物。王震是当年沪上政商两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年随任伯年学画，自有一副好笔墨。吴昌硕潦倒卖不出画的时候，王震大量收购其画，给予吴昌硕极大的经济支持，为吴昌硕在沪上打开局面鼎力相助。吴昌硕一辈子感恩王震，展览中有多幅为王震画所作的题诗题记，足见情意绵长。

吴昌硕与清末宿臣翁同龢的交谊，在展览中也有尽情展现。翁同龢赠送吴昌硕的一共三幅作品，都在展览中。一幅斗牛图卷，两副对联：“玉德金声寓于石 明窗大几清无尘”“米老襟怀云山墨 莱公诗句野渡横”。吴昌硕只是给翁同龢送过印章，阴差阳错，二人并未谋面。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出二人惺惺相惜，是彼此的知音，也可以看出吴昌硕交往的朋友圈真的很广，三教九流，名门望族，官场商海，都不乏其人。这一点，和石涛有些许相似。比石涛幸运的是，晚年的吴昌硕走红沪上，成为画坛领袖。

吴昌硕为沈翰（沈钧儒之父）未竟遗墨《墨蟹图》补蟹螯和水草，并题记曰：“补其遗墨，秋思萧然，人琴之感，又增几许。”让人感受到吴昌硕重情重义温情的一面。同样，吴昌硕八十岁时赠送梅兰芳的《墨梅图》并题诗有句：“风吹梅树花，着衣幻作雨。”亦可见其情意温馨的一面。

展览中有吴昌硕书写的一副大幅对联：“风波即大道 尘土有至情。”这应该是他对于朋友也是对于世情的夫子自道。难得在这样的画展中，能够看到一个画家从籍籍无名到声名鼎盛的各个时期一些内心情感与思想的涟漪轻起，意在象外，让我有些感动，还有一些想象。

如今，流行朋友圈。除孤家寡人，古今中外，谁都有朋友圈。朋友是自己的倒影；蔓延开来的朋友圈，是自己生活品性乃至性格命运的镜像。看不清自己，或看不清他人，看自己或他人的朋友圈，便是最为详尽而形象的注脚。看似一团乱麻，编织出的东西却大不一样，可以还是一团乱麻，也可以是一天云锦。看吴昌硕的朋友圈，会让我们有所感悟，也会让我们汗颜。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读史札记】

千秋争议隆中对

□安立志

在国人的阅读体验中，诸葛亮是“三国”的魂、“三国”的骨，没有诸葛亮的“三国”，如同没有林黛玉的“红楼”，不可想象。《三国演义》七实三虚，诸葛亮的出场，罗贯中制造了许多悬念，作了大量铺排，荆襄民谣，水镜荐贤，徐庶回马，三顾茅庐，层层递进，一波三折，吊足了读者胃口。从诸葛亮闪亮登场，到诸葛亮彪炳史册，最根本、最重要、最成功的剧情就是“隆中对”。

“定三分隆中决策”，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回目，体现了对诸葛亮的仰慕与钦敬，而这载体就是“隆中对”。“隆中对”这篇文章也成了千古名篇，不仅载入正史与演义，而且进入了当今的中学课本。历代的史家与作家对“隆中对”的赞赏比比皆是，战略远见、战略预测、战略宏图、战略构想、战略布局，天下无匹、人间罕见等等，最根本的是“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成了“隆中对”的核心。

一些治史者发现，最早构想天下三分的是鲁肃而非孔明。在“隆中对”中，至少在文字上，通篇没提“三分”，只字未及“鼎立”，只是设定了“汉室可兴”这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倒是在鲁肃与孙权的“吴郡对”中，鲁肃预言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历史大势，更为关键的是，他直接而明确地向孙权提出“鼎足江东”的战略布局。“鼎足”者，“三足并立”或“三方对立”也。即使在时间上，“吴郡对”也比“隆中对”早了7年，而当时的诸葛亮还只是一个年方19岁、躬耕陇亩的下乡知青。然而，由于小说戏剧和影视艺术在民间的广泛影响，相信“定三分”出于“隆中对”的仍然是人群的主流。

把“隆中对”作为历史事件进行讨论，首先建基于这是一则信史。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信任。陈寿作《诸葛亮传》，历代史家评价很高。人们通常将陈寿与迁、固（司马迁、班固）或范、欧（范曄、欧阳修）相提并论，《三国志》也成为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重的“前四史”。《诸葛亮传》的最后两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在后来的岁月中，却成了陈寿的罪状。这是由于后世的人们不断神化与美化诸葛亮，逐渐将诸葛亮视为神人或完人的结果。

最早对“隆中对”未予肯定的是崔浩（？-450）。此人是北魏时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对北魏统一北方做出过重要贡献。晚唐诗人杜牧曾将此人 with 韩信、诸葛亮、司马懿相提并论。南宋学者陈亮谓此人“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张良）无以远过也……”崔浩本人作为名重当时的军事家，当然对军事战略有充分的发言权。他曾如此评论诸葛亮：“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

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二十四史全译·魏书》）这段评论的核心正是“隆中对”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他对“隆中对”这一战略构想评价不高，甚至明确指出，“隆中对”只是下策。

“隆中对”是构成诸葛亮形象的核心部分。否定了“隆中对”，至少暗淡了诸葛亮头上的光环。北宋文人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之父），是名重当时的史学家。他对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提出质疑。他在《权书·项籍》中指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苏洵作为四川人，当然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形，他甚至可能对诸葛亮当年的作战地域作过现场考察。为此他写道：“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洵议论的是诸葛亮“隆中对”构想的后一阶段的战略形势。按照诸葛亮的设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事实证明，诸葛亮的战略构想，不过是战略空想。

对许多古籍融会贯通的毛泽东，读到苏洵这段议论，显然是赞同的，他在此书空白处写下一则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这一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隆中对”这一名冠古今的重大事件总体上是否定的。毛泽东熟谙中国的历史与古籍，他在阅读中曾经写下大量评语与批注。然而，这则批语极少为人提及。大概由于诸葛亮、毛泽东都是名人，人们难以取舍之故吧！

襄阳隆中竖立着一通郭沫若的“诸葛草庐”碑，碑文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这篇碑文撰于1964年岁首，思考的是诸葛亮如果没有“隆中对”这一际遇，其历史归宿将会如何的问题。郭沫若只看到诸葛亮与陶渊明均曾隐逸，却又将二者的功业简单归为“时会”之异。陶潜曾任县令，但向无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明也曾题诗，却从无寄寓诗词的翰墨情怀。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时会”只是外部条件；自身的禀赋与能力，所处群体的使命与作用，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如果将成败仅仅归为“时会”，难免有“宿命论”之嫌。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